

## 學術工作合法性的反思： 從超越「理論與實務」的分類開始談起

張文強\*

### 《摘要》

本研究是在處理學術工作合法性問題。在實務工作者不曾間斷質疑學術理論效用的同時，愈來愈多的學者，生產愈來愈多的理論，我們也愈來愈需要停下來，重新處理這個好像不是問題的問題。

處理這個問題得先從否定理論與實務這種分類開始。因為我們莫名其妙服膺這種分類共識，以及學術界發展的專門常規，讓實務工作者自認缺乏能力，把發展理論的合法性讓給學者。只是在各自常規造成各自僵化，學術理論又被視為眾多論述型式之一的當代，學術工作合法性需要重新被審視。新合法性來自一種學者與實務工作者的新關係。在雙方合作生產知識過程中，學者可以掌握更多反思機會與能力，看到隱藏於實務工作背後的常規束縛，藉此幫助忙於工作的實務工作者，自行考量不同情境加上創意，為自己打造出不斷超越自我的策略。

關鍵詞：合法性、理論、實務、論述、學術工作

---

\*輔仁大學新聞傳播系副教授。E-mail: maco1002@mails.fju.edu.tw

## 壹、「理論與實務」的斷裂與學術合法性

一直以來，「理論」與「實務」的斷裂，始終糾纏著新聞傳播這類社會學科，因此我們經常可以發現一種割裂場景。場景一邊是研究者努力建構理論，感嘆實務工作只講技術，不重視理論，但另一邊卻是實務工作者透過不同語言包裝，「學校的新聞學理論不適用於實務工作」、「理論與實務之間總有距離」。在這割裂場景內，雙方對理論問題各有牢騷，雖然總有人試圖拉近彼此距離，但差距卻也好像總是存在。世界是斷裂開的，一邊一國，各說各話。

對實務工作者來說，這種斷裂或許並不重要，因為發完牢騷後，只要繼續容忍或忽略慣用常規的缺陷，不理會所謂的理論，他們還是可以用原來工作方式解決大部份問題。可是對生產理論的研究者來說，特別是在當代社會默許學術圈擁有、甚至壟斷理論生產權力的狀態下，便很難採取同樣視而不見的態度。因為這種斷裂涉及一種深層的學術理論實踐問題，也就是我們生產的理論到底有沒有用？又或者我們憑什麼認為我們的理論具有引導實務功能？如果我們的理論無法在另一個世界得到充份實踐，那麼這個看似不大不小的問題便遙指一個危機，學術工作的合法性究竟在哪？而這也是本文要討論的核心問題。

### 一、重新討論合法性問題的必要

在過去，便有部份研究者試圖回應這些以實務為名，批評學術理論無用的說法（de Burgh, 2003; McClintock, 2001; Skinner, Gasher & Compton, 2001），他們多半採用常識觀點界定理論與實務，討論大學在知識生產與教育過程中的缺失，思考該如何更有效地融入社群或實務圈，讓理論走出象牙塔；或嚐試與實務工作保持夥伴關係，進行所謂行動研究，以期縮小理論與實務的差距（Greenwood & Levin, 2001; Leavitt,

1989)。又或者部份學者利用知識角度，更為深入地討論理論與實務的內涵差異，例如認為理論需要考慮情境與默識構面，才能在實務中有效運作(Mandl, Gruber & Renkl, 1995 ; Raelin, 1997)。因此 Schon (1983, 1987) 強調教育過程中，做中學與反思的重要性，而鍾蔚文、臧國仁、陳百齡 (1996) 則更詳細地加入陳述性知識、程序性知識等構面，試圖重整新聞傳播教育的內涵與訓練方式。

不可否認地，這些努力的確看到了理論與實務斷裂的問題，也於技術層次提出部份策略，試圖讓理論更有用，或設法讓理論更普及。可是無論是從常識性觀點，還是進一步加入知識角度的討論，這些研究似乎都站在一個類似、需要被質疑的立場進行論述。他們不約同地預設理論與實務是兩個不同世界，理論建構是研究者的工作，理論則等同於經過系統化研究方法取得的學術理論，然後在這立場上，討論該如何讓學術理論在實務世界變得更有用。基本上，我們理解這種論述立場相當符合社會共識，但卻也主張它是需要被質疑的。因為它有著一個更為根本、未被充份討論的問題，也就是理論與實務真是兩個世界嗎？為什麼理論得幾乎等同於學術理論？實務工作者是否應該也具有理論能力與權力，進行自我超越，即便他們不懂學術格式。

如果我們回到後設層次似乎可以發現，過去研究，更或者是社會對於理論與實務的二分，好像並沒有太多實質必要和憑據。如同其它分類對比型式，這種二分更多是基於我們習慣透過語言分類建立秩序的理由 (Ellis, 1993)。至少在當代大學與學者角色尚未出現，這種分類流行以前，理論與實務根本就是同一個混雜世界，所有人可以同時使用、生產知識。沒有區分，世界一樣順暢運作。只是依賴語言思考的我們，愈來愈想當然地相信這種語言分類指涉的真實性，誇大或看錯了斷裂問題的本質。所以即便過去研究很努力讓實務界接受理論，但理論與實務卻像打破的兩瓣鏡子，無論怎麼拼湊，還是會有嫌隙。

更重要地，就學術工作來說，有關理論與實務二分共識的質疑，更象徵重新思考學術工作合法性的必要。在過去，理論與實務二分不只安

排了知識生產與使用的分工型式，更為學術工作帶來看似自然的合法性。只是由於這種共識同樣無法充份解釋為何學術世界提出的理論就具有合法性？就具有足以引導實務工作的能力與權力？或者反過來，實務工作者為何沒有理論能力？因此，質疑理論與實務二分，連帶或者更深層的意含是，我們需要處理自身的合法性問題。或者更準確地說，我們透過質疑這種二分共識，凸顯過去學術工作合法性的薄弱，與重新思考的必要。

基本上，過去因共識而存在的合法性，像是建立在沙丘上的城堡。因為既然源自共識，所以本質是易碎的，會隨某方不信任而動搖。因此，一旦學術界想站在上位帶領實務工作，來自人性的不服便經常在實務這邊發酵。很多實務工作者雖然說不出所以然，雖然面對學者提出各種讓理論更有用、更普及的說服策略，但他們的不服總會轉換成譏諷、挑戰與不信任，笑弄理論無用、學術工作者存在的價值。不知道為什麼需要學術理論？這些理論能幫他們什麼忙？

或者當實務工作者沒讀過學術理論也能上手、甚至做得更好，可以說的頭頭是道；部份實務者直言我們只會用複雜統計工具、研究論述格式、奇怪名詞，說一些他們都懂的東西時，我們需要面對的，似乎就不再只是如何讓學術理論有用這個問題，也不能只是問該如何使理論變得更普及，如何教的更好。配合有關理論與實務二分共識的質疑，學術工作者或許得更積極、更殘酷地自我審思，學術工作合法性究竟在哪？研究者究竟應該做些什麼？與實務工作保持怎樣的關係。

特別當我們回到自己的世界，愈來愈多的學者、生產愈來愈多的學術理論，似乎也愈加催促我們思考自身合法性的問題。我們有必要謙虛、謹慎地想想，我們究竟為了什麼做研究？研究到底有多少用？難道只是如同碩士論文標示畢業這個意義而已。或者只是因為我們居於學校，只是因為我們會那些文譚譚的理論、複雜的研究方法，所以我們提出的東西就一定比實務工作者好？自然有了合法性？而且更弔詭地，當我們置身於沒有絕對權威的後現代視野下，如果學術理論只是眾多論述

型式之一，傳統研究心態與合法性站得住腳嗎？

因此，我們主張從質疑理論與實務這種分類開始，重整新的合法性觀點，才能看到學術工作存在的新可能。否則因二分共識帶來的合法性迷思，很容易讓我們只會做研究，卻忘了問為何要做研究這個大問題。如果我們喜歡把新聞工作者視為新聞生產機器，那麼我們好像也成為學術生產線上的工人，只會在異化狀態下，利用類似工作方式，不斷生產、複製理論，看不到其他可能。所以接下來，我們將先透過對理論與實務這種二分共識的質疑，挑戰傳統合法性觀點，然後藉由有關學術與實務常規的討論，重新處理學術工作合法性問題。

## 二、研究論述策略

就研究論述策略而言，由於我們主張研究者個人對問題的提問、觀察與思考，才是研究主軸，只是為了更加精緻思考深度，避免個人式獨白，所以研究過程還得配合過去文獻、一手經驗資料，反覆衝撞檢驗個人思考脈絡，促使更精緻的理論逐步浮現出來。落實於本研究，本研究論證過程便是以研究者對合法性問題的思考為主軸，經過反覆融會相關文獻、參與觀察經驗資料，完成最後論述，提出我們對合法性的看法。雖然受限文字書寫限制，整篇論述還是無法詳盡展現反覆思考過程，也比原有思考過程更為系統化，但我們認為，這種書寫方式最能貼近研究者的思考主軸與論證邏輯過程。也最可以同步展現我們合法性理論的逐步浮現過程，合法性理論是如何思考、論證與精緻化的。

另外，我們也想藉由這種研究論述方式，凸顯與實踐本研究對於某些學術常規的質疑。我們認為傳統從研究動機、文獻探討到結論的研究方式，雖然適合假設驗證式的研究邏輯，但其形成的常規，卻極有可能讓研究者為了配合制式章節，削足適履地切割整個研究思考過程。或為迎合文獻探討此一固定章節，不是花很多時間在閱讀摘要文獻，便是急著想從過去文獻找一個理論做為切入點，然後利用經驗資料證明過去理論的對錯。如此一來，不但忘了解決問題的理論應該來自各方，不應只

有既定的單一論述角度；更忘記在研究過程中，個人想像與反思的重要性，研究者的思考才是研究主體，而非讓文獻反客為主，以致我們總是在測試或補綴過去理論，而非去研究自己看到的問題（有關常規部份將在後面有進一步討論）。

因此，本研究主要透過兩門課程教學機會，著手進行參與觀察研究，以政大新聞系碩士專班 21 位同學，以及輔仁大學大傳所 21 位同學做為對象，觀察上課對話、平時與期末作業內容，以及私下互動，進行研究論述的精緻化動作。我們相信，平均工作年資十二年的在職專班同學能夠提供許多實務界觀點，看到他們如何與所謂的理論世界互動。對比一般研究生學習經驗，和回溯過去其他研究，約 40 位實務新聞工作者的深度訪談資料，將可提供有趣、多樣化的觀察。換言之，整篇論述呈現的是研究者主導，參照相關文獻、不同觀察的結果，雖然我們可能無法滿足傳統寫作規格與效度檢證觀點，但相信這是一次有趣的嚐試。同時，更需要感謝參與精練本論述的被觀察者。

## 貳、一個被切割成兩半的世界

想要討論學術工作合法性，或許得從重新審視理論與實務這種分類開始。在現今大學主導的知識產製體系中，理論通常被界定成學術理論，與實務分屬兩個不同世界。只是這種符映現代主義執著於分類、規則與秩序（Appleby, Covington, Hoyt, Latham & Sneider, 1996; Rosenau, 1992; Smart, 1993），以及語言習慣的分類方式，很容易讓我們掉入語言架構起的人工世界，甚少提出質疑。但實際上，理論與實務也許只是語言切割開的世界，並沒有實質區分必要。因此，斷裂只是過度執著這種分類的結果，而由此取得合法性的學術工作也顯得相對虛弱，有重新審視必要。

## 一、因語言分類而產生的斷裂

基於某種對秩序的渴求，我們似乎很習慣生活在語言分類支撐起的世界裡，讓原本渾沌的世界顯得條理分明，簡潔乾淨（Ellis, 1993）。而且不僅常人如此，學者也喜歡使用這種方式進行分析解釋，透過分類、表格、對比，讓問題變得有秩序。只是如果細究，這種方法雖然產生了看似清晰、理性的學術理論，卻也付出相當代價，硬是犧牲許多本來存在的灰色地帶，過份誇張某些差異，以致出現許多原本不存在、不適當的解釋。Goody（1977）便主張，傳統人類學雖然以「文明」、「野蠻」這種分類，成功創造一套清楚對比的理論，但也正由於這分類的過度對比與切割，簡化文明發展連續性，因此看不到所謂野蠻世界也有文明活動，對問題做出了不適當解釋。

在大學取得知識產製主導權的現代場景中，理論與實務便也是一種類似語言分類，將原本合一的知識產製與使用切割開來，形成某種分工，由大學體系得到壟斷理論知識發言權的合法性（Spink, 2001; Whitley, 1995），生產特定規格的學術理論。因此，所謂的理论被窄化成學術理論，成為合法知識的來源，一般人自行生產理論解決問題的可能性則被忽略。

我們可以在許多場合詭異地發現，雖然雙方在「理論到底有沒有用」這個問題上爭論不休，但對「理論」與「實務」這種分類方式，以及學者生產理論的合法性卻有著極大共識。所以即便我們觀察的在職進修者放不下對理論的質疑，即便他們在作業與課堂討論中，直言或委婉表達對理論的不信任、不可行，但他們還是希望想回到學校進修（當然這包含文憑因素在內），最想獲得的也是他們所批評的理論，弔詭地希望理論能幫他們充實實務。當然這裡指的理論都是學術理論。他們與我們似乎都未曾想過，為什麼實務工作者沒有自己的理論能力，不能自行充實或超越自己？學術理論又能真正幫助他們嗎？最後，一定要有理論與實務這樣的區分嗎？不過無論如何，我們在爭議中站穩了生產理論的合法

性。

或者我們也可以發現，無論課堂上或課堂下的對話，「我們」/「你們」總是無意地與「理論」/「實務」交替出現，充份展現語言學提及的人際功能(Halliday, 1973)，透過對話持續地區分雙方，替自己定位。講台劃開了兩邊，他們站位於實務，從台下遙望理論世界，儘管可能不服氣於學者與學者的理論，但卻相信這種區分的合法性，相信學者在理論生產上的特權。相對處在台上的我們，則有意無意與研究對象保持一段距離，繼續生產、講授理論。只是當這些理論與想要解釋的真實世界有距離感，或者過份簡化(Bourdieu, 1990)，我們的理論在實務世界遭遇挫折，似乎便無需大驚小怪。斷裂問題也不會因為實務工作者甘願回到學校而自動消失，理論無用的質疑還是偷偷展現在話語之中。學術工作合法性成為這種莫名共識下的迷思。

可是理論與實務真是兩個斷裂的世界嗎？如果我們想像一個場景，在大學、學者出現之前，沒有學術理論，實務工作者還是可以完成工作；或者在我們與實務工作者互動中，放下學術理論身段，發現只要他們願意，實務工作者便可以把自己會的東西，文字化成某種理論論述，雖然長的不像學術理論，但有一定品質；又或者如果我們承認很多看似龐大的新聞學理論，例如客觀性原則是源自實務的觀察與作法(Schudson, 1978)。我們應該可以相信，理論與實務間其實具有某種神秘交纏的關係，其實是相同的世界。只不過因為後來這組語言分類形成兩個看似條理分明的世界，習慣秩序的我們，反而不相信原先混沌的本質，不相信灰色地帶的可能性。也就是說，語言切割出的理論與實務兩世界，雖然形式上契合當代大學與學者職業的出現，以及對應而生的知識產製與知識使用分工型態，但回到實體層次，我們似乎沒有足夠理由認為，雙方活在不同世界，學者之外的實務工作者沒有理論能力，只能跟隨學者產製的學術理論。

也因此我們主張，理論與實務的斷裂最好止於語言層次，只是為了溝通目的，從知識生產使用角度所給予的兩個名詞（但這裡也得小心語



言分類的作用，知識的生產與使用並不一定是兩回事，很多時候，我們邊用知識邊生產知識，或邊生產知識邊用知識，只是我們不自覺）。更或者視此為一種因語言分類產生的庸人自擾，回到實體層次，理論與實務指稱的是一個相同的知識問題。實務工作者可以擁有理論能力進行觀察研究，在工作中自行解決問題、自我超越，雖然他們不見得會用學術理論規格表達。而學者是一種後來才出現的職業，學術理論也只是眾多論述型式之一，在知識世界中，也許，根本沒有必然存在的必要性。

## 二、斷裂表象下的同一世界

從在職工作者的期末報告，我們便可以進一步看到理論與實務遙指相同世界的痕跡。在語言表象下，雙方經常是在相同世界觀察相同問題，實務工作者也有發展漂亮理論的機會。理論與實務這種區分，與伴隨的學術合法性是十分薄弱的。

我們發現，即便「我們缺乏理論」幾乎是在職同學的共識，甚至成爲一種焦慮，但這並不代表他們沒有理論能力。相反地，很多被他們形容成「不值得研究的個人經驗」，其實是非常「學術」的，甚至就是學術界做過的問題。有位經驗豐富的編譯感覺他如何篩選外電是個問題，也有些個人心得（雖然這些心得有許多侷限），便與 White（1950）研究編譯挑選外電新聞的標準，是同一個問題。

或者討論最多的消息來源問題，幾位記者同學的觀察便不遜於學者提出的理論。他們沒有讀過 Giber 與 Johnson（1961）談的消息來源關係模式，卻也在與消息來源朝夕相處過程中，看到了「對立」、「共生」、「同化」的概念，了解獨家新聞壓力下，與消息來源的愛恨關係與拿捏策略。一位在職同學更透過舞女的比喻，細膩生動地解釋了台灣本地政治新聞運作情形。在她描述下，記者像是舞女，得在不對等狀態，掙得被政治人物包養的機會，戰戰兢兢服侍他們，換取獨家新聞這種小費。或在不小心得罪他們時，努力修補關係，不然只好認命等待被拋棄的那刻到來。這裡我們似乎看到 Gans(1979)描述記者如何與消息來源共舞的

影子。

這些例子可以證明，斷裂表象後面其實有著相同世界，實務工作者是所謂的常人，而常人具有提出常人理論的能力(Furnham,1988)，只是他們沒有意願與信心，把這種帶有默識成份的知識陳述出來。只是他們不會用學術方式表達，喜歡用「舞女」、「線民」等通俗詞彙，取代「資訊津貼」、「消息來源」這些有學術共識的字眼。或者有時他們的論述方式像聊天一樣鬆散，但他們確實可以看到與學者類似的問題，發展出精緻的比喻，一定結構的論述。甚至隨經驗累積，不自覺創造出帶有其特色的知識與策略。如果他們願意更精緻化自己的論述，這些論述不僅會比那些用別人理論所做的學術研究更優，也比許多研究站在上位，為教導實務界所提出的策略更貼近實務情境，也更有用。

但有趣的是，即便他們可以與研究者一樣，站在同樣世界觀察同樣問題，可是他們實務工作的自信，卻被理論與實務的分界線所阻隔，自動放棄這種權力，間接成就了學者的合法性。在交談對話中，我們不斷遭遇善意懷疑，「真的可以做嗎？」，「這真是學術研究嗎？」，「我不知道這可以是研究！」。他們不相信出身實務圈的自己具有理論能力。即便我們再三鼓勵深化平日工作經驗做為研究報告題目，但他們總還是擔心那些東西不值得研究、不是學術問題。例如有關舞女的討論，即便那位作者可以滔滔不絕地講述這種觀察，但非得等到我搬出 Gans (1979) 如何用共舞這個比喻描述記者與消息來源的互動，以及 Gandy (1982) 談到的資訊津貼理論時，她才願意相信她的看法「可能」可以是一個理論，可以研究，雖然同時間還是展現出猶豫的眼神。

這種反覆出現的不安，除了代表他們有著三不五時需要安慰的心靈，除了部份來自對學術研究常規與格式的不熟悉。更重要的是，他們被那條分類界線綁住，因為學術世界的複雜論文格式、研究方法與統計分析工具，誤認學術理論是那麼的艱澀複雜，高不可攀（當然也可能有著不屑的心情）。我們經常發現，在閱讀學術研究報告時，這些東西幾乎吸引了他們目光，看到的總是文章中的統計方法、實驗設計等部份，

一碰到卡方檢定、因素分析、實驗分組，便自動投降。或認為我們懂得統計、懂得隨機抽樣很偉大，所以我們是學者，卻忽略那些學術報告談的內容並不難懂，甚至就是他平日觀察的，他們也有類似能力。在幾次互動中，當我要他們跳過研究方法那部份時，他們才恍然知道那篇文章談的東西其實並不難。

也因此這裡有些可惜、同時諷刺的是，如果我們同意好研究來自生活中的經驗與實踐（Bourdieu, 1990; Mills, 1959），同意實務工作者也有理論能力，那麼學者的理論應該來自、並回到實務生活，而直接接觸實務的人應該有更好的研究機會。不過依舊是那條不理自明的界線同時限制了雙方，讓雙方各自進入某種出神狀態。實務者放棄在工作中自我超越的權力，不信自己也有成就知識的可能。一想到做研究、一談到期末報告，便如同一般研究生，著了魔似地趕忙回到書本理論中，依照學術研究的刻板樣子，弄一份中規中矩，但無趣的「學術」研究，難以實踐我們從工作經驗或困難處找題目的建議。相對地，研究者則經常躲在理論生產特權的背後，刻板地從理論書本中找尋研究題目，忘記回到生活中做研究、實踐研究。或者不是關起門拼命做研究，便是用社會導師的心情，提出一堆缺乏情境考量的建議與策略。沉醉在因莫名共識形成的合法性中，只是在用學術常規生產所謂的學術理論而已。

## 參、兩個掉入慣性常規的世界

雖然我們主張理論與實務沒有實質區分必要，過度強調只會鞏固看似自然的學術工作合法性。只是我們也不否認在現實狀態下，隨著這種語言切割，兩個世界各自累積的工作方式與常規，的確回過頭強化了切割的合法性，讓彼此看起來具有實際差異。

但這裡更值得注意的問題是，兩個世界各自累積的慣性常規，不只反映我們喜歡利用常規處理問題的習性，也分別產生了不同程度傷害。

理論世界的特定學術常規不僅形成一種門檻，讓實務工作者誤以為自己不會做研究，也容易讓學者過份執著於型式，只是不斷生產研究理論，卻忽略為何要做研究？理論的意義又在哪？這類合法性問題。相對地，在不信任學術理論，又不認為自己有理論能力的同時，實務工作者似乎也只能反覆用舊招式解決問題，看不到自我超越的機會。因此，常規讓兩個世界僵化。不過在這困境中，一種學術工作的新合法性似乎由此而生。

### 一、樣貌固定或僵化的學術世界

理論與實務二分反映一種大家默認的知識分工邏輯，由專職理論生產的學者，設法以幾種研究方法觀察實務經驗（雖然這些學術觀察絕大部份是一種有距離的觀察），規則化為文字理論，然後傳給學生或實務工作者，期望他們學會後成為高手。只是在運用學者製造的理論時，依工作情境調整是不可或缺的動作（Bransford, Vye, Adams & Perfetto, 1990; Lave, 1988; Lave & Wenger, 1990），也得小心文字理論不能捕捉實務工作中的大量默識（Scribner, 1986; Sternberg, Wagner & Okagaki, 1993），否則總會有著實踐困難。

不過學者在製造理論的同時，也製造了許多常規或格式，一方面複雜展示標準學術研究的長相，藉此區分其它型式論述，讓不熟悉標準的新手與實務工作者，誤以為自己沒有理論能力。另一方面這些常規格式雖有其必要性，適度使用可以增加研究效度，但也經常由於研究者的過度執著，停滯了理論世界。

首先，這些學術常規展現在論文報告形式層次。在職同學對論文格式便有著異常的關注，他們自認不懂論文寫作形式，總希望我們給一個標準範本。或有人反過來認為繳出一份有標準章節的期末報告草稿，就代表懂得如何做研究。因此，「不會寫報告」通常意味著不懂論文章節編排、不知引述方式等。不然便是如同一般研究生，文獻探討是整段整段地摘要或照抄，因為他們認為學術研究一定要有文獻探討這章，而這

章就是得這樣寫。因為過份順服形式，反而無法理解文獻探討的真正精神。不過，學會論文寫作格式並不代表會做研究。

其次，常規更展現在如何做的層次。我們發現，一般研究生或在職生對於抽樣、設計問卷，這些研究方法教課書中記載最多的部份，也有著同樣嚴重憂慮，認為這是另一個決定報告是否屬學術研究的重點。他們對這些東西執著，有經驗研究者或許也會如此，甚至更容易深陷其中，錯認懂得這些就懂得做研究。相較之下，如何找題目、如何有邏輯地進行研究、如何從資料中發現新東西，這些較少、或根本不包含在學術研究刻板印象中的東西，便不受重視。

只是不重視並不代表這些環節沒有常規，或者這部份常規反而是用更隱秘的方式引導研究。例如對他們來說，研究就是制式化地從書本找題目，頂多找個理論搭配，一切是那麼理所當然。所以他們總無法理解為何要花那麼多時間，反覆討論、表徵與釐清題目，甚至認為是我們在故意找麻煩。或者迫於我們打分數的權力，雖然會改題目，但很多人好像怎麼改還是一樣，因為他們根本不會質疑自己找題目的常規方式。不過再次地，我們這些有經驗研究者好像也經常使用這些常規，只是可能比較細緻，或者更頑固些。當然也有研究者懂得如何不被綁住。

也就是說，這些常規困住了實務工作者，成就學術工作在他們心中僵化、制式的印象。或者由於過份執著的關係，實務工作者進入學術研究情境後，經常有著一種靈魂出竅般的能力退化，這些文字工作者平日寫新聞或企劃案的邏輯似乎全都消失不見。與一般研究生一樣，他們只是靠少數制式關鍵字尋找文獻，一篇篇摘要，不曾思考這些文獻與題目的關連；行文經常缺乏連貫性，整個論文像是拼貼起來的東西，或只是名詞解釋，看不到他們對自己研究問題的思考邏輯。當然，這可能是由於論文較長，維持邏輯較不容易造成。但在他們多次表達需要知道學術格式、如何引述、調查法執行步驟的同時，我們發現，過份拘泥常規形式，反讓他們誤解做研究的實質內涵（這點研究者同樣也要小心），許多在實務中培養出來的能力也於瞬間退化。為了減少挫折，他們不斷以

兩個世界大不同為理由，為自己再次確認學術工作是另一個世界的事。也因此不相信自己是具有理論能力的，自己在工作中看到的問題、自己發展的理論論述，是與研究者類似，不見得比較差或沒有價值的。

不過學術常規不只困住了實務工作者，也會為有經驗的研究者帶來麻煩，同樣處在僵化、制式的世界中。有經驗研究者雖然很少再為常規格式感到不安，但卻也容易反過來由於過份熟悉，同樣困於其中，常常不自覺地固守在自己流派領域，只看到某類問題、只會從某些理論切入、只會用某種方法（鍾蔚文，2002）。很多研究似乎便只是在把自己擅長的理論觀點，純熟複雜的研究方法設計，填放入制式化的章節。或者因為我們認為所謂的學者，是讀過很多別人沒讀過的理論，而研究又有文獻探討這固定章節，所以很多時候反而讓文獻反客為主地成為研究主體。只關心是否看完了所有文獻，卻忘了文獻探討另一個，或許更主要功能是在刺激與深化自己對研究問題的思考。在這裡，我們並非否定常規格式與文獻探討的必要，也相信藉此可以做出好研究。只是我們擔心過份在意這些東西，反會讓研究者這個主體，在整個研究過程中成為配角，只像是在串場。不敢提問、不敢思考、不敢想像。讓我們不是在解決自己看到的問題，而是在用別人的東西，複製某個領域的研究。或者，我們主張，現存常規格式外，學術世界也存在不同的研究論述方式。

因此，當研究成為一種特殊文類(genre)，或學術界獨家工作，當我們在努力研究過程中，忘了研究者這個主體？忘了問為什麼要做研究？這個研究有什麼意義？研究方法與格式為什麼就只有這幾種？這些固定樣式、固定理論觀點、固定方法的研究，往往只讓學者看到符合自己流派的結論。理論世界類似 Kuhn (1970) 的常態科學，被不同流派割據，彼此忙著鞏固、修補各自領域合法性，很難進行真正的對話、真正的創新。而這些特定觀點的研究，僵化了學術世界，也因為過份單純化觀察問題的角度，自然無法應付多變的實務世界，招致理論無用、學術象牙塔的批評。學術研究似乎也只好躲在前述不理自明的合法性基礎內。

## 二、常規與自我超越的可能性

雖然我們同意常規的必要性，讓我們做事有個基本大綱 (Ashforth & Fried, 1988)，但過份沉溺其中，卻也容易把自己捆綁在一定規格，喪失自我超越的可能。好比研究者容易被學術常規綁住，實務工作者也面對同樣遭遇，他們對實務常規的莫明信服與依靠，或許才是造成工作無法突破的主因。而不是如想像般，是因缺乏學術理論的緣故。而如何幫助他們突破這些實務常規，進行自我超越，便留著學術合法性的新入口。

我們與在職同學互動過程中，可以清楚感受實務常規緊緊的包覆作用。雖然整學期課程便是以反思常規做為主軸；雖然預期到打破常規的困難，特別在學期前幾週，刻意反覆討論反思常規的重要；雖然這些同學努力超乎預期，可是整學期下來，我們卻在各種地方遭遇常規默默反擊。而且有些戲謔地，言必稱常規，反而成為這堂打破常規課程所創造出的新常規。

在職同學承認有常規，雖然開始可能不是用這個名詞。隱約知道自己有一套與消息來源打交道的方式，工作因此變得無聊，甚至無奈，也想自我超越，所以來讀在職專班。只是常規的無意識狀態成就了常規的可怕，他們難以言明這些常規究竟是什麼，如何運作，所以更不用談如何超越。或者他們可以有效率地完成很多常規式企劃案，並且會挪用這些常規處理期末報告，卻無法察覺先想結論再蒐集資料的這種慣用方式，會帶來哪些負面影響。

這些無以名狀的常規形成一種日常生活的結構 (Giddens, 1984)，反覆不斷地結構化實務工作。或者如同部份社會學者觀察 (Collins, 1981; Goffman, 1959)，我們每日工作中，躲藏著許多規則，默默發揮牽引、束縛的力量，只是我們不自知。

從一位經驗豐富且認真的在職同學身上，可以觀察到這種現象。我們發現，出於對獨家新聞的執著，在他的課堂討論與課後作業，經常充滿獨家新聞的個案，與難得的自我批評。只是這些因追求獨家新聞累積

的個案經驗，無論成敗，似乎都順著相同方向，結構化或修補他的工作常規，讓接下來工作更加獨家新聞導向。因此，他非常重視如何建立獨家消息來源，用何種策略取得信任，在關鍵時刻用哪些小技巧，減少其他記者接觸特定消息來源的機會。相對地，寫作等其它新聞技巧則被邊緣化，至少在主動意識到的層次似乎不會被重視。也就是說，跑獨家新聞的意向，幫他建構出一套不易察覺的工作常規，這些常規不只純熟到可以教人，更是十分有用、貼近實務情境的策略知識。不過隨常規愈來愈精緻，反覆鞏固原有工作結構，常規也開始產生負面功能，以致到後來，他被獨家新聞捆綁而不自知，更難進行超越。

進一步，常規不只形成日常工作結構，或僅管有著變動的可能（Feldman, 2000; Pentland, 1995; Pentland & Rueter, 1994），只是在使用它便可大致解決問題的狀況下，習慣懶散或安於現狀的實務工作者，往往選擇順從常規做事。甚至因為過份沉溺其中，誤認自己是不能動，根本不去思考改變的可能性，這讓常規變成實務工作者無法自我超越的元兇。我們便經常發現，實務工作者的解題策略十分固定，異常遵循常規完成每日工作，而且頑強地認為這些才是最可行的作法。因此每當我們鼓勵、甚至要求跳脫常規，或以所謂的學術理論挑戰實務常規作法，他們往往直接給予「理論上是這樣，可是實務上卻……」這樣的反應，藉此合理化它們順從常規的舉動。

例如在一次討論新聞可信度與查證判斷的課堂上，我們認為記者很仰賴是「誰」提供消息做為資訊判斷標準，因此新聞很可能出錯，並進一步以效度概念提供一些建議，試圖一起討論新聞查證的其他可能方式。不過有趣的是，雖然在職同學不否認這種事實，甚至為此感到無奈，但與其他例子一樣，這次熱烈討論再次顯現他們被當下常規作法套牢，總認為這是現狀下的最佳選擇，總以現實因素，如這種判斷方式最快、要趕截稿時間發獨家新聞等，表明他們不得不如此。或者表示除非徹底改變現狀，否則我們提供的另類作法不可行，那只是理想上的「理論」，在「實務」上並不可能（當然，我們的作法是有可能不可行，但我們的



重點是藉此討論除當下慣用解題方式外，還有其他可能)。在他們委婉善意的語句下，有著同樣堅定的眼神，「雖然我們很想改，雖然我們也很無奈，但作法就是當下這樣」。不然就是在我們看似取得共識後沒多久，突然在其他場合發現他們還是用原本方法做事。

這種不滿意現在，卻害怕變動的作法，雖然符合人性，但卻也反覆將實務工作者鎖在常規架構起的工作結構中，而且還會隨著每天工作，不斷回過頭強化既有常規的制約能力。基本上，我們的確同意工作必須考慮各種現實條件限制（Chung, Tsang, Chen & Chen, 1998），但我們也相信新情境、新工具會改變條件限制，讓舊有常規喪失合法性。只是當實務工作者錯將現狀當成絕對，或因追求安全穩當而被現實緊緊纏住，他們將看不到、也不允許其他可能性。忘記即便當下常規也是經過多次嘗試精練出來的，在瓶頸時，是可以、也必須被改變的，只要考量周詳，新作法並不一定會讓自己成為「烈士」。

也因此，與常規拔河過程中，我們深刻領會超越常規是如此困難，而這種追求當下穩定的莫名狀態，也成為在職同學（其實也包含我們）無法突破、為一成不變工作感到無奈的主因。所以即便回到學校，接受所謂的學術理論訓練，這些理論頂多只是幫他們多記得些名詞，並無法實質改變什麼，他們還是會用原來方法處理事情。所以為了自我超越，為了找到常規以外的新作法，他們更需要的可能是勇氣，相信自己有能力生產知識，不斷反思當下常規策略，為自己帶來不斷超越的可能。而在這裡，研究者或許便找到新的合法性基礎。

## 肆、學術研究的合法性： 提供實務工作者超越自我的可能

在主張放棄理論與實務二分，實務工作者也可能有不錯理論能力的同時，學術工作合法性將面對重新討論的必要。特別在所謂知識經濟時

代，如果知識重要，卻又如同管理理論被批評為只是學術界（包含管理顧問產業）製造的商品（Hellström & Raman, 2001; Scarbrough, 2001）；或在知識與權力關係被明白指出，學術理論只是眾多型式論述之一，不再具有神聖光環的當代（Foucault, 1980; Lyotard, 1999），我們認為研究者應該勇敢和過去知識產製的權力結構脫勾，重新尋找新的合法性，與實務工作謀求一種新關係。

因此，我們提出一種新知識遊戲概念處理合法性問題。只是得先說明，新知識遊戲，是本研究順著之前討論與反思，進一步提出的一種合法性選擇。我們雖然主張它更適合當代情境，更適合解決理論與實務斷裂問題，但卻沒有認定這是一種唯一或必然的選擇。因為這種選擇有著前述思考論證背景；因為基於某種適度的無政府主義心態，我們相信學術工作應該保持更多論述的可能性（後面會有更多說明）。其次，這比喻也不是主張知識生產是隨便、娛樂、無所謂的，只是想要相對於過去的嚴肅、權威、學者中心，用一種較為輕柔、開放、共同參與、帶有即興創造的態度，看待知識生產與學術工作合法性。

在知識遊戲概念中，我們相對弱化了研究者的地位，有用知識是由雙方共同完成的，研究者不再居於絕對主導地位，甚至實務工作者有能力獨力完成遊戲，達成最終自我超越的目的。或者既然這是一種遊戲，實務工作者也有選擇不參與的權力。學術工作合法性不再來自雙方莫名共識，或特有文類與常規，而是在知識應該有助自我超越的基礎上，因為研究者可能擁有更多反思機會與能力（不過只要願意，實務工作者自己也可以有這種能力），看到隱藏、持續作用的常規結構，然後將這些觀察交由平日忙於工作的實務工作者，做為一種自我超越的觸媒，在他們自己主導下，考慮不同情境限制，盡情讓理論變形，為自己形成一套套不斷自我超越的策略。

### 一、合法性重建的需求

在過去，理論與實務二分其實便暗示了學術工作的合法性。因為我

們共識地相信兩個世界不同，各有所司；共識地允許理論生產能力匯集在研究者身上，所以學術工作自有其合法性，或者根本是個不需討論的問題。這種安排讓學術成爲一種嚴肅的生產工作，依賴特定學術常規，並且多少帶有壟斷、排他特質，不對等的位階，研究者想居於上位達成教育或教化的任務。

不過如同前面討論，這種因共識存在的合法性是薄弱的，隨時會因共識鬆動而動搖。如果我們願意自找麻煩地重新審視「理論沒用」這項關鍵批評，便可發現它是一種對學術工作合法性的嚴肅指控。如果理論沒用，學術工作存在的價值是什麼？特別當我們有愈來愈多學者，生產愈來愈多理論，爲數龐大的理論更將稀釋學術工作合法性，研究者也愈來愈不值錢。

或者當我們發現，如同常人理論主張（Gergen & Semin, 1990），常人有理論論述能力，而且品質不見得比學者差；以及把學術理論當成一般論述、權威性大減的所謂後現代精神，其實也都呼應我們觀察結果。只要願意，實務工作者是可以與研究者一樣，具有生產知識能力，或根本就是身處在同一世界中的同一群人，只是學術特定工作規則與語彙文類（Bazerman, 1987; Maingueneau, 2002），是實務者不熟悉的（這並不代表這套規則沒有實質價值）。我們不能因爲研究者站在既定位子，會這套語言與規則，就有生產知識權力，說出來的就是合法知識。無論是那些強調直接運用的實用性研究，或是做爲人類解放標準的傳統大論述，應該都是如此。

因此，放棄理論與實務二分，也意味著放棄由學術圈壟斷知識合法性的立場。知識生產應該可以成爲一種開放、共同參與、帶有即興創作的新知識遊戲。學者與實務工作者開始出現一種新關係，知識理論不再由學者單方主導，硬梆梆地遵照特定規則，想要教導、教化或解放實務工作者。只要實務工作者願意，便應有能力與權力加入知識生產過程，與學者配合，或獨力產生屬於自己的理論策略，不斷進行自我超越，看到現有常規作法之外更多的可能性。

不過我們想要強調，我們並不想進入極端的相對主義世界，所以這裡的放棄或許帶有一些禪的意味，是一種對語言的反思與超越，是指懂得語言招致的過度效果，主張適度忽略語言形式，回到實體層次思考問題。同時，如果真實世界還是存在大學制度，還是存在一群學術工作者，我們便得在這種現實中，重新思考自身角色與學術工作合法性，除非這些東西都消失不見，回歸社會精緻分工前的原始純真年代，否則我們很難瀟灑地將合法性擱置一旁。雖然我們的確認為兩者都可以具有研究的潛能，雖然我很想豪邁進入那種虛無的無政府主義世界，不做任何區分與定義、什麼都行。

## 二、新合法性

新合法性也許得回到前面所提的常規與自我超越中尋找，是一種幫助平日忙於工作的實務工作者，看到實務工作中有哪些常規結構，這些常規又如何綁住他們的能力。然後讓實務工作者在此基礎上，考慮不同真實情境，自行打造不斷自我超越的具體策略。

如同我們在在職同學身上看到常規作用普遍存在，讓他們在結構中喪失能動性、創意，更不用談自我超越。不過如果我們認同每個人自我超越的必要（當然我們也可以選擇不理會超越的問題，自在活在當下），在新知識遊戲中，以研究為主業的研究者雖然不再壟斷知識生產，但卻由於能夠適度抽離每天繁忙的例行實務工作，所以可在類似現象學或民俗方法研究 (Douglas, 1970; Garfinkel, 1984) 的基礎上，有著更多專注於反思常規結構的機會，幫助實務工作者看到它們的作用（當然只要願意，實務工作者自己也有這種能力），找到學術工作合法性的新可能。

在這種改變下，學術工作將不等同於陷入狹隘實用主義陷阱的理論，奢望透過研究找到標準步驟或策略，做為實務工作的指導。也不等同某些逐漸僵化，道德意味濃厚的大論述，固守某種教條，總希望達成解放的終極目的。因為在實務情境中，只要任何情境因素微妙改變 (Clancey, 1997; von Krogh & Roos, 1996; Purser & Montuori, 1995)，這

些指導意味濃厚的理論使得面對失效危機，學者的合法性也僅能繼續繫於莫名共識上，隨時有戳破的可能。

只是我們挑戰實用與解放這兩種傳統學術工作目的（Lyotard, 1999），與依附於此的合法性，並不表示學者可以不管實踐問題，只是做研究而已。因為理論是需要有實踐意味的（Craig & Tracy, 1995），否則這很容易讓做研究變成一種例行公事，不但缺乏意義，也更不負責。好像一位在職同學機敏問著：「研究都是這樣的嗎？利用複雜的研究方法，得到好像大家都知道的答案？」。也好像一般研究生，每學期總可以拼貼出幾份研究報告，缺少邏輯、缺少問題意識，甚至很多時候連他們自己都承認看不懂，為說不出這些研究的意義而徬徨苦惱。如果我們謹慎審視這種為研究而研究的心態，將會發現，雖然研究總可以得到結果，但研究者卻得在理論無用之外，面對「那又怎樣？」這種無情批評。研究將真的只是一種文字堆積的純理論，一種研究者的例行工作，缺乏意義，與外在世界脫節。

進一步，我們對過去研究的質疑，也不代表我們認為過去研究都沒有看到結構的反思能力。相對地，現象學或俗民方法研究的精神，便在找出與反思日常生活中的某些規則。或者除此以外的許多好研究，其實也深刻掌握某種常規結構，馬克思看到社會運作背後的經濟邏輯，Foucault 看到權力運作的複雜結構。

從知識遊戲觀點來看，這些好研究便有助實務工作者檢視工作常規，為有意願的人帶來突破超越的契機，發展屬於自己的工作策略。只是不可否認地，學術常規經常讓知識遊戲無法順利成形，以致許多好理論逐漸僵化，研究變成只是在跟隨某位大師、某個理論，成爲一種理論複製、檢證或者補綴的工作。因此，不但原來的好理論失去原本反思超越的意義，變成一種教條，我們自己的研究也很難看到新東西，很難看到生活中其他常規結構。更或者與自己的研究異化，只是不斷在做研究而已。

所以，我們強調的新合法性觀點，或許只是一個找回失落世界的動

作，過去許多好研究似乎便應和這種觀點。所以，我們主張學者適度放下原有身段，回到「看到常規結構」角度，重新召喚回研究的反思與超越本質。透過深刻反思，更靈巧地察覺許多隱藏於個人、組織或社會層次的結構與常規，藉此讓沉浸結構、沒有時間或習慣反思的實務工作者（或一般人），看到束縛他們的結構，然後提供一些其它可能性的線索，增加他們自行鬆綁的動力。如此，研究不再只是用來標示學術圈的存在，而是如同偉大文學作品關照日常生活中的某些困境，透過對掙扎的精緻敘述提供一些可能，促動有意願的人自我完成超越任務。

也因此，研究者所提供的線索將只是一些刺激，而不再是指導、解決實務問題的具體策略，或單方面執著於解放社會的道德論述(Delanty, 2001)。它的目的在於讓實務工作者看到更多可能性，然後在線索之上，自行選擇要不要超越；或在線索之上，考慮不斷變化的情境，即與創造屬於自己不斷超越的知識策略。又或者，因為情境因素讓具體策略不可教，因為實務工作者有生產知識與自我超越的能力，所以研究者應該讓實務工作者自行發展實際超越策略，不要再有意無意以導師或指導心態，善意地幫他們連策略都想好，更或者認為這些策略是嚴謹的，是對的，是比常人想像更好的。

### 三、實踐、超越與勇氣

新知識遊戲順暢運作除了需要研究者調整心態，還得實務工作者積極參與，特別他們負有實踐的責任。或者，如果容許這裡為了解釋方便做出一種武斷劃分，在知識生產前端，研究者扮演較重要的角色，只是一旦實務工作者做出超越的選擇，他使得隨後加入，利用研究者的反思觀察，回頭檢視常規結構長久以來的束縛，透過這種型式解放看到其它可能性，然後考慮不同情境，加入創意，自行在工作中發展具體超越策略，並實踐他們。當然再一次，實務工作者也可以有自行反思常規結構的能力，完成整場遊戲。

這種安排為研究者與實務工作者建立一種新關係，讓知識生產變得

更開放、平等，主導與發展策略的權力回到實務工作者手上，只要他們願意便有選擇超越的可能。不過新知識遊戲雖然恢復實務工作者自行建構超越策略的權力，但實踐卻是重要關鍵，他們需要願意進入遊戲，實踐自己發展的策略，才能達成自我超越的終極目的。否則很容易前功盡棄，或者變成一種紙上談兵。當然，實務工作者也有選擇留在當下的權力，安安穩穩地完成日常工作。

進一步來看，要實踐這種新知識遊戲，意味雙方得同時改變與超越傳統面對知識的心態，而這最需要的或許是勇氣。研究者要有勇氣放棄以往看似安穩的生存狀態，不再只是順著主流（Hudson & Wong, 2001），照著標準作法，對類似現象進行簡單、安全的白描。也不是站在理論上位，總想以具體策略領導實務或解放社會。研究者必須有勇氣釋出權力，用一種更輕鬆、更彈性的心態面對學術研究規則，與隱藏在實務工作背後的常規玩捉迷藏，成為知識遊戲中的一個玩家。或者說，進入知識遊戲的關鍵是研究者想要自我超越，敢放下過去常規作法的勇氣，而非這種遊戲擁有什麼獨特的技術規則。因為既然是遊戲，所以技術規則本應是靈活多變的，甚至是鼓勵打破、創新的，而且這遊戲的基本技術規則與過去並無大異，只是需要有勇氣採用不同的玩法而已。更或許，有了勇氣，研究者可以自行提出更多學術工作可能性，也將會發現，知識遊戲這個隱喻只是眾多可能之一罷了。

相對地，實務工作者也需要實踐，也需要勇氣，只是同樣不容易。我們可以發現，雖然實務工作者可以掌握某些新聞產製背後的結構，發展出品質不錯的理論論述，例如他們知道選擇消息來源的常規如何讓新聞出錯，如何讓各報新聞看起來都一樣，如何讓自己只能跟著少數消息來源轉，但卻經常只是到此為止，因為過份安於常規帶來的穩定與安全，未能繼續精緻化或提出其它具體解決策略。或者有些同學看到了超越的可能，也提出了某些有趣建議，卻也只是紙上談兵，遲遲未能實踐。對他們來說，除了需要更多精緻化的思考能力外，更需要的也是勇氣，一種願意進入知識遊戲，相信自己有自我超越能力的勇氣，敢與人不同，

敢放下手邊作法進入未知。當他們敢放棄常規帶來的安全感，也許將進入另一個更美好的境界。

在這種狀態中，實務工作者可以爲了超越，選擇回到學校，只是學校或研究者將不再只是提供學術理論，讓他們在信與不信之間矛盾掙扎，而是一個提供他們看到自己工作常規結構的地方(再一次，他們有自己發現這些常規結構的能力)。然後他們應該積極參與知識遊戲，加入創意，自己創造一套實踐策略，加入勇氣，敢不斷超越。只不過我們也主張，這種對於超越的強調並不是一種必然選擇，同樣地，實務工作者也應該有選擇留在當下常規結構的權力，如果他們覺得可以怡然自得，那又有什麼不可以？這終究是他們的選擇。

## 伍、一種適度的無政府主義心態

透過前面討論，我們主張放棄理論與實務二分，以及因這種莫名共識帶來的合法性迷思。放棄研究者在知識生產過程佔據的中心地位與權力，以及想在知識世界做爲唯一合法政府的企圖。我們需要勇敢建立新的合法性基礎。而這種學術工作合法性應該來自看到實務工作結構的能力，讓實務工作者隨後考量情境，加上創意，不斷在工作中爲自己打造自我超越策略。

不過在最後，這篇文章或許更可看成一個研究者順著自己提出的基調，對自己研究工作常規的反思與超越，試圖提供或看到另一種做研究的可能性。強調回到以研究者思考爲主軸的研究方式，而不是制式地依賴過去文獻，讓它們成爲主體。只是這裡必須用最誠懇方式表達，如同實務工作者有權選擇要不要超越，我們雖然對過去研究方式提出批評，雖然現在也不避諱地相信自己想法，但並不代表我們認爲每位研究者都需要這樣做，因爲這是一種選擇問題，或選擇之一。我們需要一種適度的無政府主義心態，不只適度放棄以學術爲知識世界中心，與做爲



知識生產唯一合法政府的心態，也要避免對於某種中心、某種標準的過份執著，以免這個研究推翻某種教條，卻又不小心促成另一種新教條。

帶著這種心情回到對研究工作的反思，我們似乎更清楚看到，理論與實務二分正是躲在研究者背後的幾個重大結構之一，讓研究者長久以來合法獨家地生產理論。可是如果跳出這種結構，其實我們與實務工作者不正活在相同世界？經常看到同樣現象，面對相同問題？如果在職同學可以看到同樣的消息來源常規問題，而且觀察不比我們差；如果非科班新聞工作者同樣可以做好工作，甚至更好，並且說的條理分明。這不正是在戲謔理論與實務二分，嘲弄我們以往的合法性。

因此，在知識世界中，為何只有我們有發言權？為何是以我們為中心，得用我們的理論引導實務工作？難道只是因為我們會這套由我們自己建立的規則？或者，當傳播研究世界本身都在為援引理論眾聲喧鬧，或者噤聲但卻執著其中之際，豈不代表連我們自己也都出現不同工作規則？都在為各自規則爭取合法性？那我們又有何理由先拋棄自身爭議，一致對外地同聲聲稱理論世界的合法性？因此，我們生產的可能真是一套套論述，而不是意涵絕對真理的知識，縱使論述間還是有品質差異。

所以在新知識遊戲中，我們需要一種適度無政府主義的勇氣，一種更為輕鬆的浪漫情懷。學者不再是統治知識生產的中心，由自己制定某些規則，然後創造特定型式的理論，想要教導或解放別人。而學術世界可能再也沒有絕對的大師、理論享有獨霸地位，我們需要容許自己不是合法論述的唯一製造者（當然包含本研究提出的觀點），是歡迎其它論述存在，敞開心胸交流的。我們也需要容許學術不是一種嚴肅僵硬的工作，承認所謂實務工作者也有參與、甚至生產更好論述的可能。或者因為常規結構會時間變化，不同角度可能看到不同結構，因此論述被使用時，都應該加上使用者即與創作的成份，產生某種變形，貼近各自使用情境。所以我們得調整角色，接受我們不是理論論述的唯一生產者，接受理論是一種暫時性論述，而且是一種在使用過程中，會變種、會增生

的暫時論述，只是有些較有超越的可能。

最後，這個研究在談超越過程，在談一種適度無政府主義的研究觀點，我們也得看似戲謔，卻認真地把整個研究看作所有可能之一（雖然我相信它有一定可信度），看作反思自己做為研究者的過程。同時，這不代表我將進入反知識的論述心態。或許我反的是壟斷知識的各種努力。反對做別人導師的心態。反對總是無意識地相信自己的觀點。反對把知識當成一切，忘記我們還有知識以外的東西，例如我們選擇超越與不超越的意志、例如生命中荒謬的本質。當然更要想想這篇文章本身的實踐問題。無論您同不同意這樣的觀點，如果它無法激起一些討論對話的火花，無法讓我們回頭反思學術工作本身的某些常規結構，進而看到一些自我超越的可能，我便要擔心這篇文章是否又只是一種學術用語的堆積，一種語言堆砌出來的庸人自擾。或者只是為學術圈增加一篇文章而已。



智慧藏

## 參考書目

- 鍾蔚文 (2002)。〈誰怕眾聲喧嘩：兼論訓練無能症〉，《中華傳播學刊》，創刊號：27-40。
- 鍾蔚文、臧國仁、陳百齡 (1996)。〈傳播教育應該教些什麼？幾個極端的想法〉，《新聞學研究》，53：107-130。
- Appleby, J., Covington, E., Hoyt, D., Latham, M. & Sneider, A. (1996). Introduction: Knowledge and postmodernism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J. Appleby, E. Covington, D. Hoyt, M. Latham, & A. Sneider (Eds.), *Knowledge and postmodernism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p.1-20). NY: Routledge.
- Ashforth, B. E. & Fried, Y. (1988). The mindlessness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s. *Human Relations*, 41(4), 305-329.
- Bazerman, C. (1987). Codifying the social scientific styles: The APA publication manual as a behaviorist rhetoric. In J. S. Nelson., A. Megill, & D. N. McCloskey (Eds.), *The rhetoric of the human science: Language and argument in scholarship and public affaire* (pp.125-144). Madison,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Bourdieu, P. (1990). *The logic of practic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Bransford, J. D., Vye, N. J., Adams, L. T. & Perfetto, G. A. (1990). Learning skills and the acquisition of knowledge. In B. F. Jones & L. Idol (Eds.), *Dimensions of thinking and cognitive in instruction* (pp.199-249). Hillsdale, NJ: LEA.
- de Burgh, H. (2003). Skills are not enough: The case for journalism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Journalism*, 4(1), 95-112.
- Chung, W. W., Tsang, K. J., Chen, P. L. & Chen, S. H. (1998). Journalistic expertise: Proposal for a research programme. Paper submitted to the information system divisi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Conference. Jerusalem, Israel.

- Clancey, W. J. (1997). The conceptual nature of knowledge, situations, and activity. In Feltaovich, P. J., Ford, K. M. & R. R. Hoffman (Eds.), *Expertise in context* (pp.25-47).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 Collins, R. (1981). On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6 (5), 984-1014.
- Craig, R. T & Tracy, K. (1995). Grounded practical theory: The case of intellectual discuss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5 (3), 248-272.
- Delanty, G. (2001). The university in the knowledge society. *Organization*, 8(2), 149-153.
- Douglas, J. D. (1970). Understanding everyday life. In J. D. Douglas (Eds.), *Understanding everyday life: Forward the reconstruction of sociological knowledge* (pp.3-44). Chicago: Aldine.
- Ellis, J. M. (1993). *Language, thought, and logics*. Evanston, Illinoi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Feldman, M. S. (2000). Organizational routines as a source of continuous change. *Organization Science*, 11(6), 611-629.
- Foucault, M.(1980).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 other writings*. New York: Pantheon.
- Furnham, A.(1988). *Lay theories: Everyday understanding of problems in the social science*. Oxford: Pergamon.
- Gans, H. J. (1979). *Deciding what's news: A study of CBS evening news, NBC nightly news, Newsweek, and Tim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Gandy, O. (1982). *Beyond agenda setting: Information subsidies and public policy*. Norwood, NJ: Ablex.
- Garfinkel, H. (1984).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Cambridge: Polity.
- Gergen, K. J. & Semin, G. R. (1990). Everyday understanding in science and daily life. In G. R. Semin & K. J. Gergen (Eds.), *Everyday understanding : Social and scientific implications* (pp.1-18). London: Sage.
- Giber, W. & Johnson, W. (1961). *The city hall beat: A study of reporters*

- and sources roles*. Norwood, NJ: Ablex.
- Giddens, A.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Goffman, E.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Doubleday.
- Goody, J. (1977). *The domestication of the savage mi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reenwood, D. & Levin, M. (2001). Re-organization universities and 'knowing how': University restructuring and knowledge cre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Organization*, 8(2), 433-440.
- Hellström, T. & Raman, S. (2001). The commodification of knowledge about knowledge: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the reification of epistemology. *Social Epistemology*, 15(3), 139-154.
- Halliday, M. A. K. (1973). *Explorations in the functions of language*. London: Edward Arnold.
- Hudson, B. A. & Wong-Mingji, D. J. (2001). Legitimacy and illegitimacy: A contest of institutional knowledge as power. *Organization*, 8(2), 396-402.
- von Krogh, G. & Roos, J. (1996). Introduction. In G. von Krogh & J. Roos (Eds.), *Managing knowledge* (pp.1-6). London: Sage.
- Kuhn, T. (197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ve, J. (1988). *Cognition in practice : Mind , mathematics and cultur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ve, J. & Wenger, E. (1990). *Situated learning: 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 CA: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learning.
- Leavitt, H. J. (1989). Educating our MBAs: On teaching what we haven't taught.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30 (3), 38-50.
- Lyotard, J. (1999).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Mandl, H. Gruber, H. & Renkl, A. (1995). Communities of practice toward expertise: Social foundation of university instruction. In P. B. Baltes,

- & Staudinger, U. M (Eds.), *Interactive Minds: Life-span perspectives on the social foundation of cognition* (pp.394-41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ingueneau, D. (2002). Analysis of an academic genre. *Discourse Studies*, 4(3), 319-342.
- McClintock, C. (2001). Spanning boundaries of knowledge and organization: Collaborations for Mind and manage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Organization*, 8(2), 349-357.
- Mills, C. W. (1959).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entland, B. T. (1995). Grammatical models of organizational processes. *Organization Science*, 6(5), 541-556.
- Pentland, B. T. & Rueter, H. H. (1994). Organizational routines as grammars of action.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9, 484-510.
- Purser, R. E. & Montuori, A. (1995). Varieties of knowledge work experience: A critical systems inquiry into the epistemologies and mindscape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M. M. Beyerlein, D. A. Johnson & S. T. Beyerlein (Eds.), *Advances in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work teams* (pp.117-161). Greenwich, Connecticut: JAI.
- Raelin, J. A. (1997). A model of work-based learning. *Organization Science*, 8(6), 563-578.
- Rosenau, P. M. (1992). *Post-modernism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sights, inroads, and intrusion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carbrough, H.(2001). Knowledge à la mode: The rise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it implications for view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Social Epistemology*, 15(3), 201-213.
- Schon, D. A. (1983). *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 Basic Books.
- Schon, D. A. (1987). *Educating 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ublishers.
- Schudson, M. (1978). *Discovering the news*. New York: Basic Books.

- Scribner, S. (1986). Thinking in action :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practical intelligence. In R. J. Sternberg & R. K. Wagner (Eds.), *Practical intelligence : Nature and origins of competence in the everyday world*. (pp.13-3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kinner, D., Gasher, M.J. & Compton, J. (2001). Putting theory to practice: A critical approach to journalism studies. *Journalism*, 2(3), 341-360.
- Smart, B. (1993). *Postmodernity*. London: Routledge.
- Spink, P. (2001). On houses, villages and knowledge. *Organization*, 8(2), 219-226.
- Sternberg, R. J., Wagner, R. K. & Okagaki, L. (1993). Practical intelligence: The nature and role of tacit knowledge in work and at school. In M. Puckett & H. W. Reese (Eds.), *Mechanisms of everyday cognition* (pp.205-229). Hillsdale, NJ: LEA.
- White, D. M. (1950). The 'gatekeeper': A case study in the selection of news. *Journalism Quarterly*, 27, 383-390.
- Whitley, R. (1995). Academic knowledge and work jurisdiction in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Studies*, 16(1), 91-105.

智慧藏

## On the Legitimacy of Academic Knowledge

Wen-Chiang Chang\*

### Abstract

This study argues that the legitimacy of academic knowledge tends to be taken for granted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Because we are used to the dichotomy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academic research is perceived as the only legitimate source of knowledge. We contend, however, that practitioners can produce useful knowledge, which render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untenable and unnecessary. The legitimacy of academic knowledge should be reconsidered. Researchers who reflect on their own roles would be in a better position to uncover the hidden routines in practice, which can in turn help practitioners develop strategies to go beyond their daily routines.

**Keywords:** legitimacy, theory, practice, discourse, academy

---

\* Wen-Chiang Cha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